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叢書(九)

基督教

東亞基督教再詮釋



陶飛亞、梁元生 編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叢書（九）

東亞基督教再詮釋

陶飛亞、梁元生編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2004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發行：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許讓成樓 7 樓
電話：(852)2609-6508（一般查詢）
(852)2609-6076（市場部）

傳真：(852)2603-7355

網址：<http://www.cuhk.edu.hk/cupress>

電郵：cup@cuhk.edu.hk

製作：瀚林智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852)2558-7800

版權所有，本刊物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
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Studies i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9)

Re-interpreting the East Asian Christianity

Edited by Tao Feiya and Philip Yuen-Sang Leung

© 2004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Chung Chi College, CUHK

Published b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stribut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7/F, Hui Yeung Shing Build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 T., Hong Kong

Tel : (852) 2609-6508 (General enquiry)

(852) 2609-6076 (Marketing Unit)

Fax : (852) 2603-7355

Website: <http://www.cuhk.edu.hk/cupress>

Email: cup@cuhk.edu.hk

Design and Production: Wise & Wide Design & Printing Co. LTD. (852) 2558-7800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book, or parts thereof, may not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now known or to be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ISBN 988-97135-3-5

Printed in Hong Kong

作者簡介（以筆劃序）

Hong Young-Gi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Church Growth, Korea

James L. Hevia 何偉亞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國際與區域研究計劃主任

Jessie G. Lutz 魯珍晞

Emeritus Professor of Rutgers University, USA

Li Li 厲荔

Assistant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of Salem State College, Salem, USA

R. G. Tiedemann 狄德滿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London University

Yim Sung Bihn 任成彬

韓國長老會神學大學基督教與文化教授

王立新

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吳梓明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教授、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吳義雄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系副主任

侯杰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

姚西伊

中國神學研究院助理教授

秦和平

西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

馬敏

華中師範大學校長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文學院副院長

陶飛亞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宗教與和平研究中心學術總監

劉家峰

華中師範大學講師、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後

賴品超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副教授、宗教系系主任

韓琦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序一

李沛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

上海大學宗教與和平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於2002年10月10至12日在上海大學聯合舉辦了一個題為「東亞基督教再詮釋：近代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與會者有來自美國、英國、韓國、日本、香港、台灣及內地的學者六十餘人，不少是該領域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

基督宗教自唐朝以景教的面貌傳入中國後；元朝繼以「也里可溫教」的名稱流行於中國的上層社會；明朝時，天主教的聖芳濟各(St. Francis Xavier)先到日本傳教，雖設法進入中國，唯始終未能成功，只能到達澳門，接著耶穌會派遣利瑪竇(Matteo Ricci)以儒生姿態到中國傳教，強調儒家與天主教可互相補充，並以高科技及文化交流等為包裝，把福音傳給士大夫階級及上流社會。其後，湯若望及南懷仁等以學識豐富而為大清國君賞識，但由於禮儀之爭，天主教的傳播走向了消沉。1807年，基督新教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到了澳門並開始翻譯聖經。基督宗教以「舶來品」的身份傳入東方已多個世紀，基督教傳教士和差會自十九世紀在中國辦學，固然是為了傳揚基督教救世的福音信息，但是他們也同時把西方先進的文化和技術傳到中國社會。由於西來的基督宗教文化與東亞本土的文化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無可避免地構成東亞地區社會、思想及文化上的衝突，故此本土教

會的自立、本色化、相適應漸漸成為東亞基督宗教教會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期望可以透過互相了解和互相融合，尋找社會和個人發展和革新的正確路線，共同為中國以至人類創造更真、更善和更美的將來。

是次會議圍繞近代以來基督宗教在東亞傳播引起的社會思想文化的變遷及與本土文化的衝突與融合，討論分別圍繞九個範疇：「基督教在東亞」、「基督教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本色化思想與活動」、「中國基督教人物研究」、「教會事業與社會服務」、「教會大學研究」、「傳教士的文化活動」、「衝突與爭議」及「基督教與地方性問題」。會議的論文質素很高，每節的討論部分氣氛熱烈，會議成果豐碩。

基督宗教在今天發展迅速的東亞的影響力有不斷增加的趨勢，研究基督宗教與東亞社會發展的互動關係、兩者在發展中如何相適應，及基督宗教在東亞社會中的角色將會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的課題。身為崇基學院的院長，我喜見這次會議的部份文章能輯成專書，公諸同道。這書的出版必定可以帶來更重深遠意義的迴響。

序二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

由上海大學宗教與和平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合辦，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協辦的「東亞基督教的再詮釋：近代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02年10月10日至12日在上海大學舉行。

自16世紀以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有3次的相遇。一次是在明清時期，主要是天主教和中國儒教的碰撞和融和；另一次是在19世紀到20世紀中葉，特別是在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之後，表現在基督教的本色化運動上；第三次相遇是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當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遇及所碰到的問題，相當複雜。在這次上海會議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衝突面，也了解到其共融性和合作面。在學術的層面上言，會議上有許多文章，介紹及應用了西方最新的方法和理論；除方法之外，會議上面學者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包括後現代的課題，有宏觀的論述、也有個案的研究，有些以理論為主探討東西基督教的問題，也有些應用實物的、口述的材料，理出具體而微的例證來闡述這兩個文化的相遇。學者們把現代的、傳統的方法，以及中國的和西方的概念與資料聚在一起，構成對話，這就是這次會議的一個嘗試。

當然，在這個會議上還有第三個層次上的相遇，也就是個人與個人的相遇、心靈與心靈的相遇。每個人從不同的地方共同會聚在一起，各人又都帶著不同的觀念和心情，要毫無阻隔地溝通，有時真不是容易的事；因為宗教信仰的不同和歷史國族背景之差異，有時難免有些爭議及辯論，但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不同文化的相遇和發展，是個必然的現象。

參與該次「東亞基督教的再詮釋：近代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與會中外學者共50餘人，會上發表的論文共45篇；而本論文集收入了會議上曾發表的17篇文章。此外，本論文集另收入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韓琦的〈科學與宗教之間：耶穌會士白晉的《易經》研究〉，雖然韓琦並未有參加上海的會議，但他的文章十分切合本論文集的主題；韓文從一個法國耶穌會會士白晉對《易經》的研究和闡釋，分析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及衝突，正好回應侯杰的文章。盼望本書的出版能為促進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甚至東亞文化的相遇，嘉惠更多對基督宗教研究感興趣的讀者。

前言 — 「東亞基督教的再詮釋：近代 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述評

陶飛亞
上海大學歷史系

在近代東西方的相遇與衝突中，基督教扮演了特殊角色，這種歷史淵源使得東西方學者對這一課題有持久的興趣。2002年10月10日至12日，「東亞基督教的再詮釋：近代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大學舉行，該會由上海大學宗教與和平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合辦，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協辦。與會中外學者50餘人，提交論文45篇，與會者咸稱這是二十年來內地關於基督教與東西文化交流「規模最大名副其實的國際會議」，諸多新論值得共饗讀者。

基督教與東亞

基督教在同屬儒學文化圈的東亞傳播，歷史命運却多有不同，各國學者都注重從文化角度詮釋這種區別。大阪城市大學高阪史朗(Kohsaka Shiro)〈天主、宙斯、馬漢還：基督教在東亞的傳播與接受〉指出，傳教士在中國用「天主」，在日本用「大日」來表達基督教「神」(Deus)的概念，都未能在本土文化中準確傳達基督宗教本義，造成了基督教在兩國的「弱化」處境，只有在朝鮮，新教將「天主」改成人們普遍信仰的天神「馬漢還」，將其與民族信仰傳統聯結，造成基督教在朝鮮廣泛傳播。

當然，對東亞三國的差異來說，這只是解釋之一。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基督教在中國：普世性與本色化之間的張力和融貫〉認為，基督教在中國文化及社會生活中一直沒有擺脫「邊緣化」處境，其原因很大程度在於基督教尚未能從理論和實踐上根本解決在華之「普世性」宣稱和「本色化」意識的關係問題，基督教在華宣道是一種「獨白」和「宣稱」，缺乏對中國文化的「體認」和「傾聽」，雖然歷史也展示了中國基督教會應該走「文化融入」的道路，但這種「融貫」的突破尚未出現，仍有待時下和將來。香港中文大學賴品超〈從東西方文化交流看現代中國基督教思想〉提出幾乎相反的看法，認為由於近現代西方文化衝擊，中國文化自身不斷在變，這使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整合問題，深化為到底與何時何種中國文化整合的問題。回顧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新教思想的發展，中國基督教思想家實際對於繼承和整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多有困惑，近年甚至有些中國基督教學者質疑基督教思想本色化的價值與必要，換言之，基督教在中國被「邊緣化」的原因并不僅在於其與中國文化的整合問題。

韓國學者對本國延納基督教的原因也有自己的看法。江原大學李光來（Kwang-Rae Lee）〈西教傳入對朝鮮後期思想的影響：作為思想重層決定的一例〉，分析李瀾等幾位朝鮮後期學者思想，認為作為西學和西教反映的「實學」的出現，標志著朝鮮長期單層文化時代的終結，而將其後期的思想結構變成重層結構，並「重層性」地決定了朝鮮後期的思想。與中日相比，朝鮮特點就在於西教是在沒有西洋傳教士幫助下的情況下自發能動地傳入的。劍橋大學金昌煥（Sebastian Chang-Hwan Kim）〈韓戰後韓國基督教窮人問題：祈福信仰還是與民眾神學〉，探討韓國基督教兩種神學即祈福信仰和民眾神學，如何回應戰後社會迫切的貧窮問題，認為它們在韓國特定歷史條件下都產生了作用，

但也都有局限。前者必須從為「自己」祈福擴展到為「他人」祈福，後者則應改變排斥西方神學的立場，從而改變在基督教世界中被邊緣化的處境。因此，對韓國來說，無論基督教的傳播還是參與社會生活，都與中日不可同日而語，其原因大有深究餘地。

與上述討論上層建築的研究不同，浙江大學戚印平〈關於遠東耶穌會士商業活動的若干問題〉，認為世上從來沒有純粹的宗教傳播，耶穌會士面對東亞高度發達的封建專制國家始終處於弱勢地位，世俗利益成了傳教的潤滑劑，在缺乏穩定經費支援的傳教初期，經商贏利是傳教士被迫的選擇。戚文為讀者描繪了忙於賺錢的傳教士的新形象，提示了基督教與東亞關係的複雜性。

範式與評價

範式與評價是此次會議上爭論疊起的題目。北京大學王立新〈近代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研究主要範式述評〉，借助庫恩範式轉換概念，認為建國以來大陸史學傳教史研究經歷了文化侵略、文化交流到現代化範式的轉換；美國史學界則經歷傳教學、衝擊與回應、傳統與現代、文化帝國主義範式到中國中心取向的演變。但當中國中心取向成為中國基督教史學術主流時，要警惕低估西方「新狹隘主義」影響，要注意在兩者間保持某種平衡，王認為薩義德「東方主義」為核心的後殖民理論似可以提供一個分析框架。顯然，王勾畫的研究範式的綫性變化是一種大致走向，在實際研究中情況會複雜的多。

香港中文大學梁元生〈基督教與中國社會：革命的、改良的或保守的、反動的力量〉，確實借助了現代化概念來分析在華傳教運動，但現代化對基督教角色轉換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他指

出基督教來華第一階段主要在下層社會傳播，只在邊緣及弱勢社群中才被人接受，促成其傾向與革命力量聯盟，但它本身並不以挑戰權貴和推翻政權為目標。第二個階段在中國尋求近代化時，由於基督教與近代化西方的密切關係就成為參考或諮詢的物件，謀求改革的官紳也不再完全排教，使傳教士和教徒有機會接近政治中心及攀升社會階梯。第三個階段即進入二十世紀後，許多基督徒躋身國家及社會領導層之列，基督教不再是弱勢者及邊緣人的宗教。然而，當基督教和掌權者結合時，也就為權力所腐蝕趨於保守，甚至走向「反動」。梁從動態發展的角度來評價基督教的政治走向，應該比簡單肯定或否定更接近歷史本相。不過，與梁認為在華基督教政治上日趨保守的看法相左，中國海洋大學孫立新的〈從中西文化角度看 19 世紀德國新教中國傳教史〉，認為基督教在文化上走向則是相反。孫指出 19 世紀德國來華傳教士借助武力和不平等條約，在西方文化優越論及對中國人偏見下極力排斥中國文化，傳教士的主導思想是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中心論，在文化上走的是單行為，他們的活動具有明顯的「文化帝國主義」性質，籠統用文化交流來描述 19 世紀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是不恰當的，文化交流是 20 世紀以後的現象。儘管孫的觀點引起爭論，但與上文一起揭示出傳教運動中政治文化運行方向的歧異性則值得關注。

同樣，對傳教事業「文化帝國主義」性質的看法總會引起異議。上海大學張元隆的〈《萬國公報》對西方國家學說的輸入〉和呂建昌的〈外國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博物館〉，分別討論了傳教士在近代中國創辦報紙和博物館的活動。張文認為《萬國公報》對西方國家學說闡述，涉及到「主權在民」、「三權分立」等西方政治的核心理論以及議會制等政治運作方法，許多人正是由此接受西方國家學說的影響，萌生變革自強思想。呂文研究了傳教士

在上海、天津和濟南等地建立的博物館，認為傳教士目的是「科學傳教」，但結果將西方博物館理念和實踐引入中國，傳播科技啟迪民智起了積極作用。兩文都認為傳教士這些文化活動開啟民智有利社會進步，不能僅以「文化侵略」視之。

評價的爭論還不止在文化方面。倫敦大學狄德滿（R. G. Tiedemann）〈他們也在服務！——1900—1945年間的華北傳教事業〉，敘述了華北傳教士在不同時期如何以溫和方式開展活動，如興辦教育及醫療，在社會動蕩特別是軍事衝突時提供避難所和人身保護，當然也包括宗教精神的激勵，從而消弭排教力量取得中國社會容忍甚至接受。他還特別指出傳教事業的發展和民族意識的覺醒以及革命運動的發展是同步的而不是相反，傳教事業引進新知識和新的社會組織有助於中國的現代化和新社會力量的興起。但歷史的矛盾性就在於基督教在促成這種變化的同時，被得益於新教育的知識份子看成是外國控制並且是過時的東西加以攻擊，而所謂新知識份子的反教仍隱現了19世紀士紳排教的舊傳統。作者認為在1920年代至抗戰那些戰火頻仍的歲月中，傳教士不懼危險留在華北，是因為他們想為中國人服務。不過，作者說明了他是有意識地選擇專門討論傳教事業的積極方面，因為也許能描繪一幅完全相反的圖畫，但這種譴責史學已經太多了，他的研究是要否定以往的陳見而希望研究者注意到傳教運動的複雜性。有趣的是與狄德滿完全相反，Salem學院厲荔〈謀求自身利益的差會：北卡羅來納傳教士在華經驗，1847-1949〉則專門討論了傳教運動的負面，文章依據對美國北卡州赴華傳教士書信的分析，認為大部分傳教士是為了擺脫自身在美國的困境而到中國實現自己的目標，是一種謀求私利的行為，他們中許多人更關注塑造一個成功傳教士的形象，因此儘管對中國的感情日深，但是中國終究是他們考慮的第二位因素，在宗教義務和中國

變幻的社會形勢中始終處於兩難境地，他們的選擇更多體現了「美國」基督徒的特性而不是他們對中國的感情，因為他們必須首先謀求自己的利益。看來，對傳教士評價的爭議並不會隨著「典範轉移」而告結束，相反，爭議似乎是永恆的，也許在這個過程中人類才能深化自己的認識。

自立運動的實踐與思想

中國基督教自立運動的研究也是會議討論的重點。針對學界流行的認為基督教自立運動始於20世紀的看法，Rutgers'大學魯珍晞(Jessie G. Lutz)在〈新教中國化在19世紀的開端〉中爭論說，基督教中國化進程以及自立運動的準備始於19世紀。她分析傳教士中國助手在最初的聖經翻譯和傳教活動中的作用，認為正如沃爾(Andrew Walls)說過的每個文明必須有自己對基督教的翻譯和理解一樣，當這些中國助手把基督教帶到鄉村時，已經「無意識」地把福音翻譯成書面的和口頭的對自己同胞更具意義的信息了，因此，儘管中國當時還沒有建立自治自養的教會團體，但基督教中國化已經開始啟動了。與流行看法不同，她認為與佛教中國化相比，基督教中國化進程要快的多，19世紀中國助手的聖經翻譯和傳教活動已經鋪下基督教中國化的基石。

不過，多數對中國基督教自立活動的研究還是集中在20世紀。Calvin學院裴士丹(Daniel H. Bays)的〈俞國楨(1852-1932)和獨立的中國新教教會：中國教會自立的第一步〉，敘述了1900年後原為美國長老會牧師的俞國楨發起的教會自立運動，認為這是中國教徒謀求組織獨立的最早例證。但他認為有關自立活動有更多的問題需要探討，例如，這些獨立的中國教會與差會是否完全分離開來，或者它們之間依然保持某種聯繫？最初

的中國基督徒會成立的動機是什麼，它們是否有意識地更加「中國化」？教會自立運動的思想體系是否可以成為一個議題，或者只是僅僅討論其組織上的自立？裴認為這一系列問題都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中國新教教會早期的自立運動。

也許並非出於偶然，幾篇論文從不同角度討論了上述問題。香港浸會大學李金強的〈近代中國第一教堂：香港浸信會自立的研究（1901-1937）〉，描述了1903年在華人牧師湯杰卿帶領下在香港建立的自立教會，分析該會從自理、自立到自養，乃至衍生發展取得自傳果實的歷程，為探討華人自立教會在香港興起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例證。內地學者的視角有所不同，比較關注傳教士對自立運動的複雜影響。中山大學吳義雄在〈關於民初中國基督教會自立運動的幾個問題〉中致力於闡明基督教自立運動的歷史條件及其早期形態，認為20世紀前期中國基督教的自立運動儘管自身有一定基礎，但這股潮流是在外國傳教士的倡導甚至設計下發展起來的。他強調如要對中國教會自立運動進行客觀的研究，就不能忽視有舉足輕重影響的傳教士。同時，他也認為除少數情況外，很難說大部分中國教會實現了真正的本色化。山東大學胡衛清的〈符號與體制：嶺東教會自立運動析論〉，同樣認為嶺東教會自立運動固然與教會內部民族意識覺醒有關，也是英國傳教士汲約翰（John C. Jibson）倡導的結果，因為在差會看來讓本地教會有一定程度的自立對教會發展有戰略意義。值得一提的是，胡指出了民族主義「符號」的作用，是通過「傳教型」體制下在權力邊緣的教會內部人員，試圖借助外部的力量來重新分配體制內部資源而實現的。以民族主義相號的自立活動，終因缺乏政治支援和本色神學基礎而難以真正實現自立。但西南民族學院秦和平的〈關於三四十年代石門坎基督教會「五運」的研究〉，卻以三四十年代貴州石門坎苗族教會的兩次「五運」為例，提供

了本土教會較為成功的典型。他分析傳教士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及本土神職人員與對苗族教會成功的原因時，認為「五年運動計劃」中苗族神職人員是主角，他們推廣宗教與教育及慈善事業、生活及風俗的改良活動，特別是提高教育層次，拓展學生就業門徑，促進了本土教會的發展。

自立或本色化思想源流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梁家麟〈還原主義與基督教本色化〉梳理 20 世紀以來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的本色化思想，認為在還原主義(Reductionism)思路下，他們都傾向與把基督教的本質簡約為倫理，倫理的最大表現是耶穌的道德人格，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但這並不是純粹的「化約論」，而是以「托古改制」的方式，旨在還原基督信仰的根本精神，因此，還原主義與復原主義(Restorationism)，成了保守主義華人教會本色化運動的兩個指導觀念，但梁文從哲學層面質疑這種進路的可行性。上海社會科學院羅偉虹〈基督教與中國民間信仰〉，則把視角從精英思想轉向民間信仰，認為民間信仰帶有原始宗教痕跡且功利性很強，無論在信仰理念和層次上，與西方基督教差距較大。但遺傳統深厚的中國農村，民間信仰借助基督教神秘主義向其滲透并與之結合，使基督教得到很大發展，這真是歷史中矛盾的豐富性。她認為太平天國和耶穌家庭就分別是這種結合的兩個不同傾向的例子，指出基督教與民間信仰相遇產生出「異端」教派的可能性。

說到底，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自立運動與本色化從基督教來說是一種「護教」運動，從中國社會來說則是組織上思想上「異質性」的基督教如何融入自身「處境」的過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潮流，這方面探討的日益深入也不過是這一進程在學術研究中的回聲而已。

基督教大學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吳梓明的〈中國教會大學－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個個案研究〉，回顧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發展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吳文具體分析了教會大學的神學與宗教教育、國學研究及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對於一直被學界忽視的教會大學與愛國主義的聯繫，他強調「許多教會大學也是重視愛國教育的，不但如此，教會大學更是嘗試在『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兩者之間尋求和諧與平衡」。這個新的看法揭示了教會大學教育內容變遷，也是基督教中國化進程在其教育領域中的反映，在這個視角下教會大學的研究可以有更豐富的內容。山東大學劉天路的〈中國基督教大學的世俗化問題〉探討了在世俗化潮流影響下，基督教大學如何保持其基督教性質這一兩難問題，認為從20年代起這些大學為適應社會變遷和中國政府要求，逐步將自己改造為中國化的大學，同時採取措施避免世俗化對其基督教性質的影響，通過對學校宗教教育與宗教生活的調整，在校園內創造基督教氣氛以培養學生品格，最終使大學培養出既具有服務社會的意識又有基督教品格的學生，以用基督教理想去影響和改造中國社會。

相比上面宏觀研究，美國Gordon學院王棟的〈兩個世界之間：中國現代化教育歷程－以嶺南大學為例（1888-1951）〉則以個案方式揭示教會大學研究中普遍意義的問題，指出過去有關研究「採取一種重視教會大學的某些方面而使另一些方面邊緣化的視角，因此形成了一種使中國教育史中某些重要方面被忽視的模式，」這使得在研究美國教育模式移植中國時關注的是衝突對抗而不是適應和整合，並在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形成中邊緣化教會大學的作用。王認為嶺南的中美教育家致力於在教育中回應中國